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50 周年院慶叢書

中西文化本原与 战略文化特性

江西元 著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rategic Culture*

时事出版社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rategic Culture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50 周年院慶叢書

國際 (GIP) 目錄號在封面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西文化本原與戰略文化特性 / 王世英著. — 北京: 時事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113-11000-0

中西文化本原與 戰略文化特性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trategic Culture*

出版者: 時事出版社

(北京): 址 總

0001: 總 袖

010): 裝 蘇 汗 送

010): 裝 裝 網 香 武

010): 頁 頁

010): 冊 冊 中

010): 冊 冊 網

010): 冊 冊 印

ISBN 978-7-113-11000-0 787 × 1092 1/16 1.18 頁 266 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18.00 元

(CIP 數據) 登錄、印刷、發行、總經銷: 時事出版社

時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文化本原与战略文化特性/江西元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80232-343-8

I. ①中… II. ①江…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②文化—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G122②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0548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66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篇

西方文化本原与战略文化特性

导论	(3)
一、西方文化本原	(3)
二、美国战略文化特性及其变化趋势	(9)
三、生成中的欧盟战略文化	(17)
四、西欧主要国家战略文化	(21)
五、中国文化本原与外交理念	(32)
六、全球化时代中国战略文化重塑	(42)
第一章 西方文化本原	(50)
第一节 西方个体主义“一有”本体之思	(50)
一、从“物有”、“神有”到“我有”	(50)
二、西方“人”与“神”本体之争的政治意义	(55)
第二节 西方二元对立世界图式	(57)
一、从“天人相分”到“倚天由人”哲学认识论	(57)
二、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 政治意义	(61)
第三节 西方文化原始价值取向	(64)
一、从“重力”“尚斗”到理性主义	(64)
二、西方非理性主义	(70)

第二章 美国战略文化特性及其变化趋势	(80)
第一节 美国战略文化特性	(80)
一、美国战略文化的历史成因	(80)
二、美国战略文化主要特征	(87)
三、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保守主义	(96)
第二节 美国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100)
一、美国国内的基本看法	(100)
二、美国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103)
三、奥巴马外交理念与战略选择	(109)
第三章 生成中的欧盟战略文化	(116)
第一节 欧盟战略文化特性与主要问题	(116)
一、欧盟战略文化特性	(116)
二、欧盟战略文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123)
三、欧盟战略文化的成因	(129)
第二节 欧盟对外战略选择	(138)
一、冷战后欧共体的战略雄心	(138)
二、寻求建立新型的欧美关系	(140)
第四章 西欧主要国家战略文化	(149)
第一节 法国战略文化:历史遗产与特性	(149)
一、历史遗产与文化特性	(149)
二、对外战略选择	(155)
第二节 英国战略文化:传统、特性与战略选择	(163)
一、历史传统与特性	(163)
二、英国的战略选择	(172)
第三节 德国战略文化传统与特性	(181)
一、历史传统与特性	(181)
二、德国的战略选择	(193)

下 篇

中国文化本原与战略文化特性

第五章 中国外交文化本原与理念选择	(205)
第一节 中国外交文化本原与理念选择	(205)
一、中国外交文化本原	(205)
二、中国外交理念选择	(207)
三、和谐世界理念实践意义	(218)
第二节 中国天下主义与民族观	(225)
一、从天下主义到新天下主义	(225)
二、从民族主义到新民族主义	(234)
三、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观	(239)
第三节 中西文化本原综合及其前景	(244)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中国战略文化重塑	(255)
第一节 时代背景、历史轨迹与发展方向	(255)
一、中国战略文化重塑的时代背景	(255)
二、中国战略文化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方向	(265)
第二节 从找回“自性”，走向“藏天下于天下”	(271)
一、找回中国战略文化“自性”	(271)
二、走向“藏天下于天下”	(280)

上 篇

西方文化本原与战略文化特性

导 论

一、西方文化本原

文化本原是人类思想、理念和自我认识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它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中西文化本原都建立在“一”这个高度抽象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上。但与中国先哲将“一”视为天下万物从“无”到“有”，又从“有”复归于“无”的不断循环往复的“天德大化流行”过程不同^①，西方哲人将“一”看作物质或精神之存“有”，即从哲学本体论、存在论或目的论意义上肯定“有”一个终极存在之物质或精神实体，此实体乃为天下万物运动与发展的终极原因与目的。从泰勒斯以降，古希腊哲人或如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等，以诸如土、火、气、水、“无定形”、数和原子等物质作为世界生成与发展之源；或如克赛诺芬尼、门尼德提、阿纳克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等，将“奴斯”、“爱与憎”、“理念”和理性（灵魂）等精神实体，作为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本原。古罗马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斐洛通过解构“思”与“在”同一的希腊哲学，使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在

^① 老子：载营魄抱一；墨子：说在有，合与一；孔子：吾道一以贯之；庄子：凡物无成于毁，复通为一。参见：司马云杰著：《大道运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55页。

希伯来的超验的神的观念下得到规定和书写”。^① 斐洛的修正之思，把欧洲中世纪带入“神有”的黑暗时期。17世纪初，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倡导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按照这种意识追求自我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标志着西方文化在西欧国家进入“我有”的新时期。如胡塞尔言：“当希腊人转向普遍、先验的理智的起源，转向本质王国时，‘普遍科学’的理想就被确立了。这个理想在近代随着笛卡尔转向主体性再次得到确立，主体性取代了古希腊的宇宙和中世纪的上帝。”^②

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人就为一种肯定、高扬、突出和强调“自我”的心智倾向所支配。这种内含“排他性”“和“崇我性”的“自我”心智，一方面使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热衷于追求自然真理性的“纯一”和“人自体”的绝对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在价值上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③ 而“世界历史”就是“特定主体的自由意志及其价值论上的自我辩护和自我肯定”。^④ 因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以“‘有’自恃、自傲、自长，总想攻伐、征服、主宰世界”。^⑤ 但是，如詹巴蒂斯塔·维柯言：“主体性”自我张扬的逻辑结果是实践哲学的虚无化；“自我”如“推到极点就是律法不再可能，就是消解传统、无法无天、普遍战争”。^⑥ 其一，“没有差异和规定的‘我’实际上不是在肯定自己，而是相反，在取消自己”。^⑦ 如果“我就是

① 黄颂杰、章雪富著：《古希腊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84页。

② 张汝伦著：《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6页。

③ 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国家篇》（又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8页。

④ 张旭东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90页。

⑤ 司马云杰著：《大道运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427页。

⑥ 汪堂家、孙向晨、丁耘著：《17世纪形而上学》，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560页。

⑦ 张汝伦著：《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59页。

我”，那就会将非我的一切视为对象，视为手段，可以任意加以支配和毁灭。西方国家要求整个世界与它们的“自由意志”实现同一反映的，正是这种追求“自我把握”和“自我同一”的古希腊逻各斯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社会被视为人之存在的本质要求和必然性，也是人类自爱和祈求永生的根本动力。但是，实际上，世界的统一性、均质化、同一化只是一种表象，在人的内心世界和人伦道德领域及人的精神方面永远都不会“同一”；单纯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不可能找到“自我”与人类社会及自然的同一。其二，建立在“我有”本体认识之上的“自我”，实际上“像围着自己尾巴打转的狗一样，拼命要抓住自己，却怎么也抓不住。那条引诱它疯狂打转的尾巴，就是时间”。“时间动摇了我思的确定性，使它无法将自己作为绝对的基础”。^① 换句话说，“自我”之思解决不了生命的有限性与存在的无限性或主观世界之有限性与客观世界之无限性的矛盾。

自古以来，西方哲人把世界抽象为“有”，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人是万物的尺度”。同时，他们又臆造出一个“彼岸世界”，从而使人与神、我与非我、思维与存在及主体与客体之二分成为西方人的基本世界图式。如黑格尔言：“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现实存在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为自己的任务”。^② 但事实上，无论是唯理论者提出的理性认识，还是经验论者所主张的感性认识，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使主体与客体之间实现沟通的桥梁。康德强调的“自我”能动作用和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精神”之辩证法，充其量只能使西方二元对立世界图式在主观或客体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西方哲人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对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随着征服自然，以求得“进步”和“增长”的“人类中心主

^① 张汝伦著：《德国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64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义”思想，在西方国家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社会意识形态，^① 价值合理性与科学合理性之间出现了普遍的割裂；人们单纯地追求科学合理性，而忽视价值合理性。结果，“就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丰富了，然而却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② 因为，“在昏暗被驱散之后，也就是返观内照、幽暗无色的精神劳作消散之后，存在好像化为欢乐的花花世界了”。^③

其次，近代以来，建立在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之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强调自我物质占有和个人利益至上的文化价值观成为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传统。这一传统使西方国家不仅把“世界历史”看作“是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把自己的自由作为根本的“理性”和“普遍的东西”展开和确立为“世界精神”的过程，^④ 而且，总是从自我的“特定角度”去看待大千世界中的人和一切是非等价值问题，并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对世界的支配来最大化西方国家人民的利益，并用物质力量将西方国家特殊的内在文化和价值属性合法化、普遍化。

与中国古代先贤以“生生不息”为本，推崇中和、用中、适中或者中庸之原始价值取向不同，西方哲人为达到更多“有”之目的，在原始价值取向上将“强力”等同于生命与德性，并由推崇寻根究底的理性精神滑向非理性主义。首先，西方文化中的“德性”一词就源于古希腊英雄时代的“战神”之名——阿喀琉斯（Achilleus），意指勇敢与强力。“强力”是希腊神话中以勇敢著称的英雄阿喀琉斯唯一能理解的善。如亚里士多德言：“人的德性就是指人的本质或本性，或人所具有的可以

① 司马云杰著：《大道运行论：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0页。

② 同上书，第750页。

③ （德）黑格尔著：《逻辑学》第1版序言，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页。

④ 张旭东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91页。

产生一些只根据他的本性的法则才可以理解的行为的力量。”^①而这种力量又与“生殖”、“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力量、德性代表着生命，而生命的存续与否则依据于生命本身具有的力量的大小。这种视德性、力量与生命为同一的思想观念，使古希腊人普遍把荣誉视为一个人在社会中立足的关键。在古罗马时代，“强力”作为人之本性、神的天意或自然法则得到进一步肯定，成为古罗马元老院制定《罗马法》的基础。《罗马法》明确规定，“强力”就是权力与正义，从而以律法的形式肯定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的正当性。如成中英言：在罗马精神之下，理性、宗教，都变成工具，它就是征服、霸占，占领市场，用各种方式来进行权力的掌握。

其次，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体现了罗马公民自由意志的“强力”，由古希腊的德性、人之本性变为基督教徒之最高的善。经托马斯·阿奎那和圣·奥古斯希腊化改造过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作为自然存在之物，是上帝赋予其智慧与力量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基督教神学把强者拥有更多权力的观念及对“强力”的价值肯定确立在神的旨意之上，为近代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法权扩张提供了新的精神依据。如司马云杰言：随着商业资本竞争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适者生存法则搬到人类社会后，斗争、竞争、强胜劣汰成为时代最时髦、最强有力的哲学。各种各样的自然主义和经验实在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社会行为学，都把人看成生存竞争者，并在肯定人的这一本质时，利用各种制度和物质刺激使人行动起来，进行竞争和斗争，从而造成了人类自身的不安宁。^②再次，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视斗争为万物之母的原始价值取向，为近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核心——“契约论”奠定了思想基础。17世纪后，托马斯·霍布斯、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等欧洲思想家基于“引向产生的是‘战争与冲突’，引向焚烧的

^① 亚里士多德著：《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页。

^② 司马云杰著：《大道运行论：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7页。

(毁灭万物)是‘和谐与和平’”^①等古希腊原始价值取向,建立了现代西方政治学。他们从人的天性—自私出发,看待人类社会与政治生活,并认为,人对自然具有同他的力量一样大的权力;在自然中,一切东西都是属于有力量据为己有的人。

第四,执著于对客观事物寻根究底的理性精神是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固有的一种原始价值取向与思想特质。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哲人一生殚精竭虑地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逻辑论证,通过构筑各种范畴体系引导人超越感性世界,追求存在的原因或真理。在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上升时期,启蒙思想家用理性精神,批判地看待一切事物,主张一切事物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接受它的审判。但如同任何事物一样,理性本身也存在着一种悖论,或所谓“理性的吊诡”,即科学或理性一味向外探求,却昧于自身的目的。换句话说,理性自身无法从整体上说明人类活动的意义,也不能提供有终极目的的知识。

第五,自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哲学面临着二元论的内在矛盾与多元系统的外在冲突的双重困境下,西方现代哲人开始进行一场以解构理性为主旨的,所谓超越理念(柏拉图)、心物二元(笛卡尔)、知识架构(康德)、精神本质(黑格尔)的思想运动。^②在19世纪末、20世纪西方国家出现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社会思潮中,诸如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义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过程哲学和自然主义等人文主义学派都倾向于非理性主义。

20世纪后,非理性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几乎都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形式。如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自始,就有意识地拒绝客观地研究独立于意识的现实,只研究不变的环境中个人行为的实用性。奎因还明确提出“有用就是真理”的原则。^③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及先验哲学在美国不断地

^① 黄颂杰、章雪富著:《古希腊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15页。

^② 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第一卷“论中西哲学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184页

被祛魅，美国人愈益关注的只是知识和权力、认识与控制以及话语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美国的人文学者也不再从历史的角度，而是从统治与被统治的结构中看待科学、道德和艺术。因此，美国的人文学科研究也“聚焦在生产、分配以及权力形式的流通上”。^①

二、美国战略文化特性及其变化趋势

源于欧洲文明与北美洲荒野殖民双重历史经验而产生的美国战略文化的根本特性在于：一方面，西方文化内在的，诸如理性（科学理性）与血性（非理性）、“神我”与“自我”的张力，不仅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得更加显明、尖锐与突出，而且在形式上呈现出更高程度和更加紧密的相互渗透、融合、重叠与共生；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共有的文化要素与美国立国后产生的特有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双重结构。这种双重结构使西方文化中理性、上帝意识和罗马法精神三者之间的张力及其相互渗透的深度比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更加突出，并造成美国外交战略中内向、保守的孤立主义倾向与外向、扩张性的自由国际主义政策长期并存。首先，作为“欧洲启蒙运动之子”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仅一贯高扬科学理性精神，使之成为美国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一，而且将西方理性精神所内涵的征服自然意识，扩展为寻求征服、控制、同化世界上其他非我族类。这种自我扩张意识与美国早期移民向西部拓展新边疆过程中，大规模灭杀北美印第安部落人群而形成的嗜血牛仔精神融为一体，使美国战略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扩张冲动更具“兽性”。伴随着这种“兽性”的不断强化和普遍化，美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强调全胜和消灭敌人团体。同时，美国社会文化中也出现了较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广泛和坚固的结构性“暴力文化”。代表这种暴力文化对美国外交政

^① 陈嘉明主编：《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06页。

策和实践产生影响的，主要是所谓“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具有明确历史方向和组织结构的自觉运动”的杰克逊主义。^①如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言：美国的杰克逊主义者“信奉原罪说、对人性和人类历史的前景持悲观和怀疑。因而他们的世界图景一片阴暗，丝毫没有光明，并相信末日即将到来。这种幽暗的末日意识使他们认定，人类不可能成功地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②因此，他们主张，综合运用意志和手段，尤其是庞大的军事力量，迫使别国屈服于美国的要求，并在必要时“消灭整个群体敌人”^③。虽然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事冒险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并未对本质上嗜血成性的美国杰克逊主义者在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对比中的地位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2009年12月初，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美国西点军校宣布向阿富汗增派三万多美军显示：“奥巴马不仅没有改变华盛顿，反而成为华盛顿的俘虏。在清理布什烂摊子的伪装下，奥巴马选择继续布什的政策。”^④其一，如查默斯·约翰逊言，“不断增加军费开支的机制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主张以频繁进行战争作为公共政策的主旨，通过在武器和军需生产方面的开支，维持庞大常备军，能够永久维持美国的经济运转。美国军队内外编织了一张既得利益网，军工产业复合体吞噬了一切。”^⑤其二，如罗伯特·卡根言：“欧洲与美国之间最明显的分歧是一个哲学或者形而上的分歧，是关于人类应该遵守

①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s of War by Lawrence Sondhaus First published 2006 by Routledge 270 Madison Ave, New York, NY1001666 页。

②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机器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66页。米德的《四分法》为我们理解美国军事行为和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有价值的分析视角。加深对这四个传统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美国领导人为什么会优先选择武力。

③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机器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48—253页。

④ (美) 安德鲁·巴切维奇：“奥巴马的蠢行”，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2月3日。

⑤ (美) 查默斯·约翰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终结”，日本《世界》月刊，2008年4月号。

丛林法则还是理性法则的分歧。欧洲人相信我们接近实现康德的理想，美国人却不信。”^① 因此，美国“在涉及实力的所有重要问题，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和对实力的渴望”等方面，仍陷在“霍布斯式的世界历史之中”。其三，追根溯源，美国战略文化中浓厚的“血性”精神及广泛存在的结构性暴力文化根植于“古罗马人的绝对主义”和古日耳曼人文化中的骑士传统。如张旅平言：“现代西方文明的根，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其主根又不在那里，而是源于古日耳曼人‘蛮族’文明之中。现代西方人的主要祖先日耳曼人不仅征服了含有希腊文化的罗马，而且还摧毁了其文明。”^② 卡尔·曼海姆在《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中亦认为，“西方人自己的作为根的原初文化的那个东西始终存在，它不仅没有被同化掉，反而持续有力。作为地方性和我群性的‘土著要素’，它始终在与作为具有普遍主义取向的基督教文化的‘流动要素’进行斗争。”^③

其次，“神我”与自性的合一，上帝意识和古罗马扩张精神的融合是西方各国文化生成和发展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④⑤} 作为西方文化集大成者，美国社会中支撑“神我”与“自性”合一的根，扎得比许多西方国家更深；上帝意识和古罗马民族扩张精神的融合在组织上也更

① (美)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② 苏国勋、张旅平、夏光著：《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版，第134页。

③ (德) K·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79页。

④ “神我”与“自性”，印度神话、宗教中的两个主要概念：前者有精神、我、人的意思，后者有“自然”、“物质”的意思。

⑤ 为了给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找到合法性，资产阶级需要使物质占有神圣化，并为此与宗教和上帝实现和解。海涅第一个明确地指出了资产阶级的这一政治需要，调和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也就是与封建农奴主和教会实现和解。人性与神性必须统一。海涅：“我们的一切新制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获得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和精神和好如初。“神我”将再次和“自性”结为一体。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64页。